

重写性别伦理

——论《荒芜的答案》中的现代爱情观与新女性意识

金小天

内容摘要：罗莎蒙德·雷曼是20世纪初“中额”文学的代表作家，长期以来被“现代主义”和“宏观叙事”的话语所遮蔽。雷曼凭借《荒芜的答案》成为一战后一代年轻人的代言人，通过再现战后流动的性别角色和情爱观念的变革，该小说改写并重塑了传统性别伦理。面向保守的中产阶级读者，雷曼抛出的是极具争议性的“性”话题，如女性性欲、性别角色的错置、甚至同性之爱，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放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伦理环境转变的语境中进行考量。《荒芜的答案》的女性意识杂糅着“激进”与“保守”的态度，为我们解读“中额”文学的伦理立场和现代性悖论提供了一个范本。

关键词：性别伦理；爱情观；新女性意识；现代性悖论

作者简介：金小天，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英国20世纪初女性文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战之间英国女性文学的伦理观与现代性探析”【项目批号：13CWW03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Rewriting Gender Ethics: Modern Love and New Woman Consciousness in *Dusty Answer*

Abstract: Rosamond Lehmann is a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female writer representative of the middlebrow. She and her works have long been overshadowed by discourses revolving around “Modernism” and “grand narratives”. With her debut novel *Dusty Answer*, Lehmann came to be the speaker for the post-First World War generation. The novel rewrites and reshapes gender ethics by capturing post-war gender roles in flux and enormously alters concepts of love, sex and gender relations. Facing the conservative middle-class readers, Lehmann boldly writes about controversial sexual issues of female sexuality, reversed gender roles and even same-sex love, issues that must be examined in the shifting ethical and moral context of 19th-century *fin-de-siècle* Britain.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as reflected in *Dusty Answer* mingles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impulses, exemplary of the middlebrow ethical position and a paradoxical form of modernity.

Key words: gender ethics; concept of love; new woman consciousness; paradox of modernity

Author: Jin Xiaoti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She focuses o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iddlebrow writing after completing her Ph.D. study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ail: ttskye@hotmail.com

谈到20世纪初的英国女作家，罗莎蒙德·雷曼（Rosamond Lehmann, 1901-1990）往往鲜为人知。她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同时代，可较之于后者今天的文学史地位，雷曼则显

得籍籍无名。雷曼一生中创作七部小说，一部戏剧以及多本短篇小说集，大多表现女性的情感世界。在两战间的创作高峰期，她曾拥有大批读者，作品佳评如潮，但二战后，她却一度被遗忘。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维拉果出版社（Virago Press）的创始人卡蒙·卡利尔（Carmen Callil）重印了几本她的代表作，她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雷曼对此深表感激，认为这是她作为小说家的重生，但她的影响力再也没能恢复到 20 世纪头几十年的势头。雷曼在批评史上地位的式微并不难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长久以来构筑 20 世纪初文学史的模式，即一个以现代主义和“宏观历史”叙事为中心的话语集。雷曼显然处于这幅图景的边缘。艺术风格上，她延续着现实主义的传统，与标新立异的先锋派相疏离；到三十年代，当国际国内局势紧张恶化、男性知识话语和文艺创作大都渗入资本主义危机意识时，雷曼的书写似乎与国家、民族、政治无关，而是一味专注于一个隐秘、主观、且私人化的女性情感世界。正是因为如此，她的作品在二战后被屡斥为过于“女性化”和伤感怀旧。

今天当我们重新探讨雷曼的小说，不仅要分析其艺术性，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 20 世纪初英国具体的伦理环境中观照其作品中的性别政治，我们将不难发现作者与现代派的关联。本文将聚焦于雷曼的处女作《荒芜的答案》（*Dusty Answer*, 1927），分析作者对性别角色与两性关系的改写，并由此呈现战后一代人的爱情观，以及试图挣脱传统束缚的女性意识。小说表面上透过几段异性、同性关系描写女性的情感幻灭，但其现代性意涵却远不止于此。面向保守的中产阶级读者，雷曼抛出的是极具争议感的“性”话题，如女性性欲、性别角色错置、甚至同性之爱。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放置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性科学和性意识崛起的语境中去考量，并且结合一战后被扰乱的性别秩序对之进行思考，从而辨析小说中现代爱情观与女性主义的具体内涵，检视《荒芜的答案》如何对当时主流的、以异性恋话语为核心的性别伦理进行改写。需要注意的是，该书的性别政治和现代性是悖论式的，这一点笔者将在文章最后结合“中额文学”（middlebrow）的特点与伦理立场加以论述。

—

对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人而言，旧有伦理道德的瓦解是一战带来的种种后果之一。但事实上，早在战前世纪之交的几十年，知识界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性、性欲及两性关系问题的辩论，在认识论与学理上催生了新观念。尼可拉·鲍曼谈及 19 世纪英国人的性观念时指出：“性是个禁忌话题。性欲，尤其是女人的性欲被视为可怕的，因而被否认了”（Beauman 121）。广而论之，在维多利亚时代，基于贞节观的性道德将婚姻视作性的唯一合法场所。由于 19 世纪末出现的一系列的社会文化转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开始悄然改变，随之产生了不同话语，使得“性”的能见度大大提高。19 世纪九十年代关于优生学的辩论，缘起于英国在南非战场上的失利，医学专家指出生育质量下降导致士兵体质孱弱，因而反对以僵化的道德标准、门第观念作为婚姻的基础，也就是反对将之作为性的基础，认为这会导致激情的丧失。很快，“自由恋爱”得到提倡，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个新式而危险的关系，却得到 H·G·威尔斯（H. G. Wells）、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等进步思想家的赞赏。与此同时，“新女性”作家们不断在文学作品中再现女性性欲和“错置”的性别角色，引来保守者的不满，挑起“性”与“性别”问题的激烈论争。当然，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是弗洛伊德和其他性心理学家们的著作，他们使得“性”

作为一门科学建立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公众对之的理解。下面笔者将主要梳理有关女性性欲、性向的“科学”话语，并分析这些话语所隐含的政治目的。

在19世纪末出现的性话语中，过去闻所未闻的女性性欲也开始为人们所认知。“新女性”作品对女性性身份的建构虽然不失其进步性，却常常是扭曲而片面的。^①对女性性欲的理论分析和科学研究则是由当时的性心理学家来完成。卡彭特在《爱的成熟》里阐述女性性欲与性愉悦的合法性，指出女性的性自由是通向更好的社会的重要途径：“与男性相比，女性应当有更大的自由来处理性关系中的问题，使之更能满足她的需要——应当尽量减少法律、习俗、经济对性的束缚，而只是依赖于她的天性和本能”（Carpenter 62）。英国性学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数哈维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他对两性性象的研究最初成书后被禁，但最终，在1910年以《性心理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为题发表；同年，弗洛伊德的《性欲三论》（*Three Contributions to a Theory of Sex*）的英译本也公诸于世。不得不提的是，艾利斯与卡彭特的读者只集中于少数医学专业人士，而到了二十年代，“弗洛伊德的福音”几乎家喻户晓，他告诉人们“不受抑制的性生活是身心健康的首要条件”（Graves and Hodge 103）。尽管弗洛伊德后来对女性气质的阐述完全是“菲勒斯中心”式的，与妇女解放的愿景相悖，但他在1895年的《癔症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中所分析的女性性压抑和精神病的关联，在当时有着革命性的意义。

除了男性性学家，玛丽·斯特普（Marie Stopes）是一位在性科学的普及中功不可没的女性。斯特普既是一位优生学家，又是妇女权益活动家。1918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婚姻性知识手册——《婚姻之爱》（*Married Love*），这本小册子大为畅销，“性”被升华为神秘且神圣的体验，很多人第一次了解女性在性关系中并非被动，相反，女性情欲是积极自主的能量，激发婚姻中掩藏的潜力。不少读者写信感激斯特普在这个话题上无所畏惧、坦率直接，拯救了她们的婚姻。《婚姻之爱》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写作市场，之后出现的婚姻手册都对独立的、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女性性欲加以肯定。当然，这局限于婚内性关系。作为优生学家和生育控制运动的支持者，斯特普的主要贡献是在已婚妇女中推广避孕，提高女性的生理掌控，帮助其将婚姻与事业结合起来。

对女性性欲的科学认可同时也伴随着婚姻理念和两性关系的变化。在《爱的成熟》（1896）中，卡彭特批判“对女性长期奴役”的婚姻体制，呼吁一个“更自由和友爱、而非狭隘的独占关系”（Carpenter 80）。这一时期“同伴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成为一个时髦的概念，代表着一种两性结合的理想，强调性的和谐与精神价值的契合。另一方面，威尔斯、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激进派则全力支持“自由恋爱”和婚外性行为。在《婚姻与道德》（1929）中，罗素论及“试婚”（*trial marriage*）时说道：“如果一对男女要去做结婚生子这件严肃的事情，之前没有性经验绝不是件好事……在婚姻的生理机能充分实现的前提下，合理的程序应当是直到女方怀孕，婚姻才具有法律约束力”（Russell 109-10）。罗素还认为婚外性关系不构成离婚的理由，因为避孕措施降低了私生子的机率：“比起传统看法来，现在可以不再认为通奸是件多么严重的事了”（Russell 149）。实际上，他是在为“开放式婚姻”（*open marriage*）辩护。由于避孕使得性更加安全，两战之间的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比率大为增加，但斯特普的初衷是靠控制生育提高婚姻质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

当异性恋中的女性性欲逐步被科学话语自然化，女同性恋现象还鲜为人知。《荒芜的答案》对同性恋与双性恋身份的探索，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之举，这也是它产生轰动效

应的主要原因。19世纪末,奥斯卡·王尔德的案例让男同性恋成为公众谈资,但女同性恋仍遮蔽于阴影中,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女性之间的性关系是不可思议的事。在对女同性恋的文学再现研究中,莉莲·菲德曼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托马斯·洛奇(Thomas Lodge)的作品,洛奇描写带有强烈情感性质的女性“友爱”关系,大体上追随“希腊罗马范式”(Faderman 67)。在此之后,“浪漫友情”塑造着17、18世纪、以及大部分19世纪对此的文学想像。萨利·雷吉在她对19世纪末“新女性”小说的研究中发现,即便充满情欲色彩的场景,如女性间的亲吻和拥抱,也丝毫不会引起读者的怀疑和不安,因为“女同志主义”(lesbianism)这个词在当时法律和医学术语中是不存在的。^②

这样一来,女同性恋身份建构的话语权便落入男性性学家和医生手中,可想而知,其结果必然是片面而扭曲的。1860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韦斯特法(Carl von Westphal)首先提出“先天性倒错”的理论,用来描述童年起便开始偏好男装打扮和男性活动的女性,称之为“医学上的反常现象”(Smith-Rosenberg 269)。如此一来,女同性恋的欲望对象成了男性的体能和文化特权,而非其他女性。艾利斯提出“倒错者”(inverts)和“变态者”(perverts)的概念,前者是先天的,后者则是在其他女性“靠近”后习得的(Smith-Rosenberg 270)。艾利斯还将女权运动和中产阶级中的女同性恋现象联系起来,认为妇女争取政治权益是同性欲望产生的根源。后来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对这些早期的病理学分析深感失望,“病态论”实际上阻碍了女同性恋身份的真实表达。

由于认知的匮乏、并内化现存的科学话语,20世纪初探索同性欲望的女性作家多采用医学范式或含糊的语言。瑞克里芙·霍尔(Radcliffe Hall)的《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 1928)是前者的一个标准范本,小说充斥着“倒错者”与“变态者”的原型,刻画女同性恋的身份焦灼和灰暗压抑的生活,但这部作品超越了“浪漫友情”,进入更为真实的同性爱世界。有批评家指出,作为必要的女权主义策略,两战间的女作家塑造“男性化的女同志”形象、用男性装扮和其他性别隐喻为妇女在公共空间争取权利。

然而,更多女作家在这个话题上使用极为隐晦的方式。战后的文学作品中不乏这样的例子,行文间涌动一股女同性爱的叙述暗流,女主人公隐匿的性倾向常常由其情欲的觉醒昭示出来。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点,是采用遁语和含混风格,从而使得“友谊”与“爱情”之间的分野难以辨认。但如苏珊·克勒蒙所言,这一时期的女同性恋文本充满“暗码”,既是躲过审查的工具,也可能变为“误读的媒介”,社会权力机制便伺机渗透(Clements 15)。如伍尔夫在《存在的刹那:史特雷品牌的别针无尖端》中所揭示的,由于社会加诸女性的心理障碍及表达禁忌,使得她们无从认清自身的性本质。

对女性解放而言,将女性性欲自然化、合法化的科学话语无疑有其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这些话语也成为权力的延伸,服务于政治或社会利益,管控女性的性与性别角色。不少女性主义批评家揭示出男性科学权威的实质,即规范女性性欲,使之符合异性恋社会的标准。更确切地说,这些科学话语通过强化女性“妻子”与“母亲”的性别角色,对不符合此定义的女性施以排斥。例如,弗洛伊德一方面认为女性所患精神疾病与她们受限的生活相关,另一方面则强调异性恋关系的重要性,将不婚女性和女同性恋者污蔑为非正常、不健康的人。作家温妮弗雷·霍特碧(Winifred Holtby)以辛辣的口吻评价两战之间的情形:心理医生和性学家们到处提醒女性完整的性体验无比重要,否则“她们就像腐烂的果子一样被冠以种种症状”(Berry and Bishop 54)。在《持久的激情》(*Enduring Passion*)中,斯特普援引“不受任何简化、陈旧偏见影响的科学观点”,将女同性爱斥责为“邪恶”和“堕落”

(Stopes 41)。与弗洛伊德围绕“阴茎羡慕”论述女性气质如出一辙，关于女同性恋的理论无一例外预设男性标准，用“缺陷”、“不足”等语言将女同性恋者定义为次等的她者。

在《英格兰的继女们》(*Step-daughters of England*)中，简·加利特(Jane Garrity)清晰地阐明国家政治定义下的女性主体：“白人、中产阶级、可生儿育女的女性身体才能与国家、帝国发展融为一体，是种族健康和民族稳定的关键”(Garrity 2)。不难发现，医学专家们鼓吹女性情欲和性健康，与当时优生运动的目的一致，在本质上是为支撑根植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理念中的“母性主义”。很显然，无法满足此标准的另类女性则沦为社会的弃儿，甚至被看作潜在的威胁。雷曼的不少作品深刻地剖析了社会性别结构，再现了它对女性角色的界定与驱逐(如 *The Weather in the Streets*)。所以，在战后二十年代——霍特碧将之讽刺为一个“忠贞变得比乱性糟得多”的时代，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鼓吹性解放的话语所具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很多时候，它们变为压制女性追求性自主的工具(Berry and Bishop 91)。

二

雷曼发表《荒芜的答案》时年仅26岁，一举成名的同时，也成为战后年轻人的代言人。当时的报刊书评认为它是“新一代最为令人瞩目的处女作”，小说的诗意品格“开启了文学新的可能性”(Simons 13)，并且将雷曼与济慈相提并论。雷曼在回忆录中谈到滚滚而至的读者来信：“不止一位女同性恋者劝我放弃失败的婚姻，邀我与她共筑爱巢……这本书仿佛引爆当时某种奇特的、难以解释的时代风潮”(Lehmann, *The Swan in the Evening* 66-7)。这股时代风潮正是由书中流动的性别角色和情爱观念的变革呈现出来，而雷曼以女性情欲、婚前性行为、同性爱等禁忌题材为表达对象，则让我们窥视到战后新女性的形貌。

与不少作家的处女作一样，《荒芜的答案》带有自传性质，可谓一部现代成长小说。乍看之下，女主人公茱迪丝·厄尔似乎又是一位我们熟悉的19世纪浪漫女性，美丽敏感、家境优越。但历经战前童年、战后青春期及至大学生活，和几段异性恋和同性爱纠葛之后，她那个安稳却虚幻的旧世界中破蛹而出，在观念意识及情感阅历上蜕变为新女性。雷切尔·杜普勒斯认为20世纪的很多女作家从事着一个共同课题，即“超越结局的书写”(DuPlessis 10)，而爱情小说则是女作家检视、挑战既有性别文化的重要场域，这主要是通过改写并颠覆传统爱情情节来完成的。如果说维多利亚小说对女主角的命运布置无非两种——婚姻或死亡，《荒芜的答案》的结局则是开放式的，或可谓之“超越结局”的。茱迪丝在尝试各式情爱戏码后摒弃一切幻想，而幻灭的同时也意味着独立，这多少带有现代主义的旨趣，也指向一种新型的爱情叙事。

《荒芜的答案》的时代感显现于它所捕捉到的性别流动性、倒错感，这与一战对性别秩序的冲击直接相关。二十年代的英国弥漫着性解放的狂欢与错觉，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战的影响。战乱使得传统道德观和性禁忌分崩离析，造成前所未有的“性”混乱，例如婚前性行为、同性恋比率飙升、军队中的淫乱现象、性病蔓延等。另一方面，战争带来性别角色的混淆也不容忽视。战场的血腥可怖严重毁损了士兵的英勇气概；而同时，无数中产阶级女性走出家庭，承担了各项战时工作，其中不乏传统意义上的男性职业，如司机、机械师或者军工厂工人。随着后方/前线二元对立的消解，性别差异也逐渐模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内涵发生质变。尼可拉·韩博论及战后颠倒的性别价值时指出：“这个时候的新男性抛弃掉诸如庄重、英雄主义等传统男性价值，转而青睐轻薄无力又略显脆弱的

举止态度。相反,新女性则是一派实际克己的男人作风:她能干、笃定而冷静”(Humble 209)。韩博进一步点明,性别角色倒错相应地导向了爱情语言、模式的转换:“当这些强悍且男性化的女人遇到柔弱、情绪化、并被她们主动情欲化的男人,一种崭新的爱情语言顺势而生”(Humble 209)。

《荒芜的答案》中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如同光谱一般,将自旧而新的各式性别样貌呈现在我们眼前。茱迪斯在不同的性别范式中游走,她微妙的筛选标准、连同她自身亦新亦旧的矛盾特质,恰好投射出现代性的悖论。菲弗家的四兄弟——茱迪斯童年时结识的邻居朋友——代表着战前战后迥异的男性气质。查理和马汀象征战前男性价值,一个是俊朗、完美青年的典范,另一个则是英格兰庄严与荣誉感的化身,对土地怀有深切眷恋。在茱迪丝的孩提时代,查理是占据她全部幻想的白马王子,他精致而脆弱,是大家宠溺和保护的对象。马汀被刻画成一个恋家者,守护着家族的老庄园:“(家)是马汀的秘密食粮,这片土地从根底上滋养着他,让他在平凡之中形成纯朴而有尊严的内核”(235)。^③茱迪斯拒绝了马汀的求婚,很明显,她的浪漫情怀和冒险精神与一个平淡如水的婚姻格格不入。查理和马汀的死亡——查理阵亡,马汀海边度假时溺水——意味着传统男性理想的陨灭和田园生活的消逝。从前线回来的朱利安和罗迪,尽管毫发无伤,心境却为战争所彻底改变。他们俨然是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笔下“失落的一代”,举止言谈玩世不恭,既颓废幻灭又喧嚣狂欢,深具矛盾感。朱利安将生活看作一出“滑稽徒劳的闹剧”(63),他愤世嫉俗,是典型的反婚姻论者。他秉持一套抽空责任义务的哲学,试图说服茱迪斯做他的情人:“我们可以享乐一阵子,而不是思考……我可以赋予你如此多的美,然后放你走”(270)。同样,罗迪也以冷漠、嘲讽的姿态对待世界,他对茱迪斯说:“我无动于衷地度日;又瞎又聋;每天都变得更瞎更聋。从不思考,也不在乎什么。大概死了更好,只是我懒到无法一枪打死自己”(246)。小说暗示罗迪与同学托尼之间的同性恋关系,而托尼带着明显的阴柔气质,“敏感的脸,阴晴不定,嘴宽,唇却美而性感……他的手指纤细、丝毫不男性化……做出各种媚态”(95)。这样的男性形象在两战间的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成为新一代男性楷模。反讽的是,这些非男性特质——感性、无力、轻佻——作为新的编码被写入男性气质,而自觉的无价值感、自我贬损或反英雄主义姿态已然演化成为一种另类英雄主义。

在探索、解读不同模式的女性气质时,《荒芜的答案》昭显出战后倒错的性别价值,同时也尝试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寻求平衡点。小说中一系列女性与二十年代愈加普遍的、非女性化或中性化的女性形象相吻合,例如查理的遗孀玛莉拉,被描绘为孩子气的、无性别的女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可悲地做了母亲;看似男性化的婕拉丁则是性学家们所谓性倒错者,她同珍妮弗(茱迪斯的剑桥同窗)之间展开了一段真实的女同性爱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荒芜的答案》把现代知识女性推至前景,将之嘲讽为传统女性气质的对立面,明显反映出当时社会普遍对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存有偏见。作为世纪之初进入剑桥格顿学院、凤毛麟角的女性之一,茱迪斯对女大学生们最初的印象出奇地糟:“像羊群一般……不成熟也不整洁,全都令人乏味,只是一大堆普普通通、无甚区别的女性生物挤在一块儿”(110)。《荒芜的答案》细致地将大学里的知识女性分为两类:一类以茱迪斯和珍妮弗为代表,兼具女性美与聪颖气质,另一类则似梅柏那样的书呆子,毫无美感可言。梅柏来自中产阶级下层,老气横秋、外表邋遢、令人生厌,茱迪斯无不讽刺地暗自思忖:“大概真正聪明的女孩儿就是这般模样”(113)。梅柏在考试中因过度紧张而精神崩溃,茱迪斯和珍妮弗整日在外游荡却成绩优异。很明显,小说在讽刺梅柏的同时,赞赏的是茱迪斯这样集传统

与现代于一身的女性，她游走于不同女性气质的疆域，却始终不曾跨越文化规范、社会习俗的临界点。这种极有分寸又不胜暧昧的现代意识在茱迪丝的同性爱尝试中尤为明显，笔者将在之后的分析中回溯这一特征。

性别角色的移位自然带来两性关系的修改。在极为紧凑的篇幅中，茱迪丝与罗迪、马汀、朱利安一一展开恋爱，其结果都是反“爱情”的，例证了雷曼挪用“传统爱情机制”来削弱主流文化的控制（Simons 29）。三个男人有如传统爱情叙事中的三类原型人物：罗迪类似“少女幻想中的狂热情种”，马汀如“朴实可靠的邻家男孩”，朱利安则是“危险却独具魅力的引诱者”（Simons 26）。相应地，他们为茱迪丝虚设的异性恋角色——放浪形骸的荡妇、循规蹈矩的村妇或是波希米亚风格的情妇——依然根植于男权宰制。茱迪丝最终弃绝这些标贴，不仅指向开放的、摒弃“圆满婚姻”（奥斯汀的所有小说）或“死亡惩戒”（《德伯家的苔丝》、《茶花女》、《红字》、《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叙事，也意味着女性意识的拓展，在情感中由依附步向独立和更广阔的空间。

伍尔夫曾在《女性的职业》中写道：“她想到一些事情，一些关于身体、关于激情的事情，不消说，作为女人的她，说这些事情并不合适。理智告诉她，男人如果听见她说这些，会震惊的。她知道，一个女人如果说出了自己激情的真实感受，男人会怎么想，这让她从艺术家的无意识状态中清醒过来。她无法再写下去”（Woolf, “Professions for Women” 288）。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描述了女性创作的另一困境：“‘克洛依喜欢奥利维娅，’我读道。突然，我强烈地意识到，变化何等之大。在文学中，或许第一次有了克洛依喜欢奥利维娅”（吴尔夫 71）。伍尔夫这里谈到的是女性写作的两大枷锁 / 禁区，一是女性情欲，二为女同性爱，皆是长期以来为传统习俗所不容的题材。而《荒芜的答案》以坦率、释放的方式表现两者，是对固有偏见的一大突破，凸显其女性主义立场。

小说对女性身体的描写甚多，流露出愉悦、自由之美。“水”的意象反复出现，隐喻女主人公情欲的苏醒。在如下场景中，少女茱迪丝在自家门前的湖中裸泳，一面偷窥隔壁花园里漫步的罗迪：“在月光下兀自游泳是一种圣洁而充满激情的神秘体验。湖水爱上了她的身体。开始时，她勉强将自己交付于水中，包裹于冷涩之中，她忍耐了一会儿，很快，她变得渴望水的拥抱、爱上了水。刺痛感逐渐平复下来，湖水随着她的运动轻柔地环绕着、抚摸着她”（48）。在湖水的诱惑和月光的渲染下，茱迪丝探索着自己的身体和初生的情欲，也是在此刻她意识到自己对罗迪的欲望：“罗迪的篇章必须写下来，而她将参与其中，直到最后——一个完美的结局”（51）。小说中多处写到她游泳、骑车、滑冰、打网球，显然指向女性身体的解放。二十年代的剑桥也为年轻女性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女学生们熟知各式各样的现代思想，肆无忌惮地谈论弗洛伊德和性话题。茱迪丝与同窗珍妮弗相互倾慕，这缘于她们在身体与气质上的彼此欣赏。雷曼不吝笔墨描写两人的情感，抹上一层情欲性的暗示，同时保有美好、明亮而自然的基调，不同于同期其他作品执着于表现灰暗、压抑和充满耻辱感的“女同性爱”经验。在茱迪丝眼中，珍妮弗恰如“温暖绚丽、光彩夺目的尤物”（120）；她散发白昼的光芒，而茱迪丝自己则带着暗夜的力量。两人同在河上泛舟、沐浴，在林间小憩、在剑桥每个角落里徜徉，有如无拘无束的山林女神。

鲍曼曾对两战间女性小说中“性”的处理作出如下区分：一种毫无掩饰、带有“色情”意味，如E·M·荷尔和伊莲·娜格林的情爱小说，通常评论界不屑一顾；另一种用虚无缥缈、甚至无性化的笔触刻画女主人公的性存在，以伍尔夫为代表。^④事实上，鲍曼区隔的是两个极端的文学样式——“低额”（lowbrow）与“高额”（highbrow）。而《荒芜的答案》

所属的“中额”小说则采用折衷态度和模糊手法, 既从性的禁锢、压抑中将女性解放出来, 又小心翼翼躲开检查制度, 避免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样, 因“淫秽”遭禁。如此一来, 《荒芜的答案》对“性”的表现尽管大胆, 却也极有分寸, 例如描写茱迪丝和罗迪的婚前性行为, 戛然而止于“他将她抱起来放在纹丝不动的柳树下”(223)。茱迪丝拥有现代女性的自由, 供她探寻未知而复杂的情爱国度, 但同时, 她的探险并非全无底线, 这尤为体现在她的同性爱经历和对自身性向的认识上。

“女同性爱”主题的引入无疑颠覆了异性恋叙事定式, 但自始至终, 茱迪丝与珍妮弗的情感仿佛包裹于云翳之中, 似爱情又似友情, 读者难以洞其本质。茱迪丝一早便意识到她对珍妮弗的迷恋已超出了朋友的界线, 但不敢对之追根究底, 担心在她俩生机盎然、如沐春风的关系背后总有某些“阴暗的想法, 布满纠缠的罗网”(137)。书中的同性爱或双性恋情愫常常表现为三角关系的彼此角逐和嫉妒, 如茱迪丝—珍妮弗—婕拉丁, 罗迪—茱迪丝—珍妮弗, 茱迪丝—罗迪—托尼; 语言是间接的、暗示性的, 例如当珍妮弗转而同婕拉丁在一起后, 她在给茱迪丝的信中写道: “从一开始我就深深爱上了你……无法向你解释我的感受……你如此纯洁, 超然尘外, 但我不是。婕拉丁也不是”(288-289)。虽然表达隐晦, 《荒芜的答案》对女同性爱的再现突破了“浪漫友情”模式或性学家定义的同性恋原型。尽管茱迪丝同珍妮弗之间关系暧昧, 珍妮弗和婕拉丁却是一对真实的同性恋, 并且她们丝毫不像模仿异性恋关系中的“倒错者”与“变态者”。在茱迪丝眼中, 婕拉丁糅合了男性力量与女性柔媚, 既硬朗又精致, 模糊了性别的边界: 她“头发短而黑, 平直地从前额往后梳着, 露出小巧、美丽的耳朵”(161), 下巴坚毅、颧骨宽阔, 有着厚重的、“埃及式的唇”, 却又闻似一朵清新的栀子花(164)。珍妮弗以她女性化的明艳气质吸引茱迪丝, 而她同婕拉丁在一起后却表现出男性气质, 剪了短发的她时常和婕拉丁在草地上比赛摔跤。在《荒芜的答案》的世界中, 性别角色、情爱关系是自由流动的, 从某种意义上预示了伍尔夫在《奥兰多》中表达的双性合一的理想。在某个瞬间, 茱迪丝突然为“竞争对手”婕拉丁所强烈吸引, 在下面这段狂热的内心独白中, 她几乎触到了“真相”:

茱迪丝在心里喊道: “告诉我你的人生!” 她的一切, 她从哪里来, 为何只身一人、神秘莫测, 为何穿这样的衣服、戴这样的珠链, 她怎么与珍妮弗相识, 她那半遮半掩的表情中隐藏着什么讯息? ……而现在, 最终, 你想请求她留下来, 让你了解她、让你爱她。对, 让你爱她。你并不是非得恨你的敌人。所有这些恨、嫉妒算什么? 有种可怕的、近乎于爱的东西, 你甚至想都不敢想。但你仍可以在刹那间爱上她, 热烈地, 爱上她的声音、双眸和她那无比白皙的手。(171-72)

这半明半暗、欲说还休的口吻贯穿着整个同性爱表达。始终, 茱迪丝和珍妮弗的感情没有被清晰命名, 其性质或为同性爱欲的(homoerotic), 也可能是同性社会的(homosocial)。韩博认为, 《荒芜的答案》在同性爱再现上故意“含糊其辞”, 处理方式上杂糅了“革命性的果敢”和谨慎态度——“战战兢兢、避免踩到引起审查者注意的雷区”(Humble 232)。事实上, 这种“含糊其辞”缘于前面提到的同性爱认知的缺乏、语言及心理障碍, 是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所致, 并非单纯的文本技巧。

在小说结尾, 已各奔东西的茱迪丝和珍妮弗相约回剑桥见面, 而后者没有出现, 茱迪丝落寞离开, 感到被剑桥这个男性世界所孤立: “永别了, 剑桥, 对于这所学校来说, 她

什么都不是。在它彬彬有礼的外壳下，它不喜欢也不信任她和其他所有女性；而现在，它只是忽略她。校园弥漫着雾霭，包裹着罗迪和托尼，还有别的男学生”（301）。无论在智性还是情感上，这里都是一个对女性充满敌意的世界。最终，茱迪丝独自一人，“无所畏也无所求”，“摆脱了最后一丝虚弱感和徒劳的依赖感”（302-03）。这份巨大的孤独感中也暗含着成熟与独立，但《荒芜的答案》所构想的新一代爱情事实上是爱情的全然失落，就异性恋和同性恋而言，都是如此。

三

尽管在整体叙事形式上，《荒芜的答案》仍然传承着 19 世纪现实主义的风格，但就其现代意识和女性主义立场而言，它与不少现代主义作品不谋而合。但是，如本文所揭示的，一旦细究下去，我们会发现该小说的现代性并非单向和同质的，而是带有含混性和悖论性，这就不得不提到中额文学大体上共通的“现代性”立场。

伍尔夫将中额文学嘲讽为“中间派”（betwixt and between），说它高不成、低不就，是一种商业化的伪艺术。但反过来看，正是这种“中间性”让中额小说获得某种两面品格，糅合了高额与低额的一些特征，在处理新旧伦理观的更迭上，显示出激进而又保守的矛盾态度。韩博在论及这种矛盾性时指出：“这一时期的‘女性中额文学’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构建和巩固、但同时也抗拒新的阶级和性别身份中起作用。正是这种悖论性的、对传统家庭伦理和激进观念的双重兴趣，令这一文学样式在意识形态上十分灵活”（Humble 3）。同样，艾莉森·莱特（Alison Light）用“保守的现代性”（conservative modernity）来描述中额文学所呈现的历史观，这一概念揭示出现代性的双向面目，朝向未来也指向过去。在考量两战之间的文学气候时，莱特得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结论，即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已由外向的、男性化的帝国扩张转变为内向的、女性化的家庭模式。相应地，私人化的“家”（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保守的、与现代无关的）成为了体验“现代”的场域，而女性正是这一现代性悖论的主体：“两战之间，是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的女性最有能力代表英国，代表它最现代和最反动的方面”（Light 10）。推而广之，更有批评家指出，“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结构”，是人们面对社会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反应”，“反应”本身就是多样或者矛盾的。^⑤ 现代体验带来机会、冒险、进化、成长的同时，也会造成破坏、焦虑、怀旧和安全感的匮乏。可以说，现代性的悖论是历史的必然，意味着人们的现代经验必然是一个协商性的、适应性的、混杂着新旧观念和复杂情绪的过程。

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荒芜的答案》都可谓是典型的中额小说，提供了一个解读暧昧现代性的范本。小说对主流性别伦理的挑战和重塑并非彻头彻尾地推翻传统，而是小心翼翼地试、推进道德底线。因此，茱迪丝所代表的女性气质是亦新亦旧的，性向是模棱两可的，而她浅尝辄止的同性爱经历最能说明雷曼对社会容忍度心知肚明。弄清楚这种现代性的暧昧性和含混性，我们才能明白《荒芜的答案》的女性意识的具体意涵。

注解【Notes】

①② See Sally Ledger, *The New Woman: Fiction and Feminism at the fin de siècle*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P, 1997) 94-121, 122-32.

③本文中的小说引文均出自 Rosamond Lehmann, *Dusty Answer* (London: Virago, 2004)，由笔者自译。以下

标注页码, 不再一一加注。

④ See Nicola Beauman, *A Very Great Profession: The Woman's Novel 1914-1939* (London: Virago, 1983) 124.

⑤ See Judy Giles, *The Parlour and the Suburb: Domestic Identities, Class, Femininity and Modernity*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4) 5-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eauman, Nicola. *A Very Great Profession: The Woman's Novel 1914-39*. London: Virago, 1983.

Berry, Paul, and Alan Bishop, eds. *Testament of a Generation: the Journalism of Vera Brittain and Winifred Holtby*. London: Virago, 1985.

Carpenter, Edward. *Love's Coming of Age*. Manchester: Labour Press Society, 1896.

Clements, Susan. "The Point of 'Slater's Pins': Misrecognition and the Narrative Closet."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13. 1 (1994): 15-26.

DuPlessis, Rachel Blau. *Writing Beyond the Ending: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Twentieth-Century Women Writ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5.

Faderman, Lillian. *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Romantic Friendship and Love between Women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5.

Garrity, Jane. *Step-daughters of England: British Women Modernists and the National Imagina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3.

Graves, Robert, and Alan Hodge. *The Long Week-end: A So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1918-1939*. London: Faber & Faber, 1940.

Humble, Nicola. *The Feminine Middlebrow Novel, 1920s to 1950s: Class, Domesticity, and Bohemianism*. Oxford: Oxford UP, 2001.

Lehmann, Rosamond. *Dusty Answer*. London: Virago, 2004.

---. *The Swan in the Evening: Fragments of an Inner Life*. London: Virago, 1982.

Light, Alison. *Forever England: Femininity, Literature, and Conservatism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Routledge, 1991.

Russell, Bertrand. *Marriage and Morals*. London: Allen & Unwin, 1976.

Simons, Judy. *Rosamond Lehmann*.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92.

Smith-Rosenberg, Carroll. "Discoveries of Sexuality and Subjectivity: The New Woman, 1870-1936."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Ed. Martin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and George Chauncey. New York: Meridian, 1989. 269-80.

Stopes, Marie. *Birth Control and Other Writings*. Bristol, Thoemmes and Tokyo: Edition Synapse, 2000.

Woolf, Virginia. "Professions for Women." *Collected Essays*. Vol. 2.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6-1967. 285-90.

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 贾辉丰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

[---. *A Room of One's Own*. Trans. Jia Huife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3.]

责任编辑: 杜娟